

# 从历史建构到城市营销： 古城更新的空间生产策略与逻辑

王佃利<sup>1,2</sup>, 王玉龙<sup>2</sup>

(1. 山东大学 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 山东 济南 250100; 2. 山东大学 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 基于空间生产理论, 古城更新实际上是涵盖了物质空间重塑、精神空间营造和社会空间重构的空间生产过程。通过对山东省十项古城更新实践的考察发现, 古城的空间生产表现为围绕历史建构而展开的古城重塑过程, 在“历史—文化”的路径之下, 针对古城空间生产的不同维度采取具体的、差异化的行动策略。而古城空间生产实质上是一个围绕城市营销而展开的权力博弈过程, 在“政治—经济”的路径之下, 行政权力、资本力量和社会力量围绕古城场所改造和业态布局、古城品牌和城市营销、古城空间使用价值等方面运转和冲突。这种路径特征意味着古城空间生产在权力运作中应捍卫不同群体所拥有的城市权利, 实现多元协同、包容差异的空间生产。

[关键词] 古城空间生产; 历史建构; 空间权力; 城市权利

[中图分类号] C912.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8353(2019)05-0167-09

DOI:10.15981/j.cnki.dongyueluncong.2019.05.020

“空间生产”理论揭示了空间的社会属性, 空间“牵涉到再生产的社会关系, 亦即性别、年龄与特定家庭组织之间的生物—生理关系, 也牵涉到生产关系, 亦即劳动及其组织的分化”<sup>①</sup>。基于空间的社会属性, 古城和古城更新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 一、古城空间生产中的政府角色

新的时空观将时空视作一种社会构造物, 不同的社会“生产了”完全不同的时空观<sup>②</sup>。承载和反映着社会时空观念的古城, 其空间生产过程也呈现出明显的“建构”特征。对地方政府而言, 古城空间生产涵盖了保护改造建筑场所、打造古城想象和城市品牌、重构人们围绕古城空间使用所形成的社会关系, 是物质空间改造、精神空间营造和社会空间重构三种话语的交织并存。古城空间生产的建构特征和不同话语, 意味着地方政府不仅承担着历史文化保护的职责, 也承担着维系内嵌于社会关系之中的政治经济秩序的责任。在古城空间生产中, 地方政府通常面临着“保护性衰败”与“建设性

---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城市治理中邻避风险处置机制研究”(17AZZ010), 山东省社科规划“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专项”项目“习近平城市治理思想研究”(18BXSXJ20), 山东大学人文社科重大项目“邻避政治: 城市治理的困境与转型”(17RWZD22) 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王佃利(1971—), 男, 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城市更新、城市治理、公共政策; 王玉龙(1990—), 男,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 研究方向: 城市政治。

①[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 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 载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年版, 第46-47页。

②[美]戴维·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 胡大平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年版, 第235页。

破坏”的挑战,也持有“采用适当规模、合适尺度,依据改造的内容与要求,妥善处理目前与将来关系”<sup>①</sup>的期许。在这二者之间,地方政府在实践中采取何种行动策略,遵循何种行动逻辑,以推进古城空间的生产?本研究基于对山东省十项古城更新的案例调研,考察和分析地方政府在古城更新中的空间生产策略和逻辑。

## 二、地方政府古城空间生产的行动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土地和空间效益开发实现了持续、快速城市增长的“城市奇迹”<sup>②</sup>,这一过程中,对古城的历史文化保护往往让位于推动经济增长的城市开发。随着当前城市发展模式的深刻转型,地方政府对古城本身所具有的历史价值与经济潜力给予了新的认识,对古城更新的热情也持续高涨。在这一热潮中,山东省的城市行动令人瞩目。作为自古以来的齐鲁之邦,山东是历史文化大省。曲阜、济南、青岛、聊城、邹城、临淄、泰安、蓬莱、烟台、青州等10座城市获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济宁、淄博、潍坊、临沂、临清、莒县、惠民、枣庄、滕州、文登等10座城市被评为“省级历史文化名城”;2014年,山东省政府确认了35处街区为第一批“山东省历史文化街区”。山东省古城的积淀可见一斑。

进入21世纪以来,山东省众多城市致力于挖掘自身古城的特色文化资源,将古城改造作为发展城市旅游业的重要推力,促进城市转型发展。到2017年,在山东省已有的11家5A级景区中,包括但不限于天下第一泉风景区、曲阜明故城(三孔)旅游区、台儿庄古城景区、青州古城景区等多数景区,都以古城、历史文化街区等历史文化元素作为景区的重要价值内核。这些已经获得认可的5A级景区,被很多城市政府视作追求的目标和行动的标杆。而与古城老旧空间改造相伴的环境整治、公共设施建设、建筑修缮等行动,也因有助于改善居民生活条件,从而成为城市政府行动的政策依据。古城空间生产实际上已成为以古城为依托的城市综合发展策略,这对地方政府充满了吸引力,地方政府在这一过程中的策略和逻辑也成为引人关注的问题。

为此,自2017年起,研究选取了济南明府城、青岛中山路、烟台所城里和朝阳街、台儿庄古城、周村古商城、青州古城、即墨古城、惠民古城、临清中洲运河古城、聊城东昌古城等十个代表性案例进行调研。一方面,这些古城空间生产行动涵盖了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地级市和县级市等各级城市政府,可见对各级政府而言,古城空间生产都成为必然的发展举措。另一方面,这些行动涵盖了不同发展水平的城市,承载着城市政府不同的期待:对经济发展较快的城市而言,如烟台,古城空间生产是经济发展中提升文化积淀的必然选项,如受访者所言“经济是很强势,但文化传承比较滞后,还没有达到城市经济文化都能共同繁荣的程度”;而在经济后发城市,如临清,正如城市管理者流露出的“抱着金饭碗讨饭吃”的情感焦虑,古城空间生产承载着管理者对刺激经济复苏的政策期待。

除此之外,不同城市在古城更新中的空间生产策略,也呈现出地方政府的行动特征。这些古城的更新行动在时间上或早或晚,在结果上或已经竣工或正在推进,其更新模式、更新思路和住民政策也因城而异(见表1)。总的来说,在更新模式上,地方政府行政权力和企业资本是古城空间生产主要的推动力量,尤以政府主导为主要模式。而在目标导向上,大多数古城都选择了通过商业化改造,打造以历史文化为载体的商业街区和旅游景区。地方政府在古城更新中或保护修缮原有历史建筑,或进行仿古重建,以期重现城市的历史文化特色。同时,在住民政策上,如青州古城、周村古商城等古城为保留人气,选择住民留居的方式,并推动居民的工作生活融入更新后的古城空间,让古城“更接地气”;而更多的古城则

<sup>①</sup>吴良镛《北京旧城与菊儿胡同》,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4年版,第68页。

<sup>②</sup>陈映芳等《都市大开发——空间生产的政治社会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

选择将原住民迁出,后期再通过商业布局重新集聚人群。

表1 山东省的古城空间生产实践及其政策特征

古城项目		启动时间	更新模式	更新思路	住民政策	目标和效果
济南明府城	曲水亭街	2013 年	政府主导	保护修缮	留居	济南老城古韵
	百花洲一期	2015 年	政府主导	保护修缮	搬迁	老城泉水文化展示街区
	红尚坊	2007 年	资本主导	仿古重建	搬迁	定位高端商业,运营不佳
	宽厚里	2015 年	资本主导	仿古重建	搬迁	仿古商业街区
青岛中山路		2012 年	政府主导	保护修缮	搬迁	德国殖民时期的空间想象
烟台历史 文化街区	所城里	2017 年	政府主导	保护修缮	搬迁	中式传统文化
	烟台山—朝阳街	2017 年	政府主导	保护修缮	搬迁	近代开埠文化
台儿庄古城		2008 年	政府主导	仿古重建	搬迁	彰显运河古城、江北水乡与大战故地的 5A 级景区
周村古商城		2001 年	政府主导	保护修缮	留居	彰显明清以来特色商业文化的 4A 级景区
青州古城		2011 年	政府主导	保护修缮	留居	彰显明清建筑风格和历史民俗文化的 5A 级景区
即墨古城		2013 年	政府主导	仿古重建	搬迁	文化产业为特色的商业街区
惠民古城	武定府衙	2008 年	政府主导	仿古重建	搬迁	打造成为旅游景点
	魏集古村落	2016 年	企业主导	仿古重建	留居	承载民俗文化的商业旅游区
临清中洲运河古城		待开展	—	保护修缮	—	急切的心态与踟躇的行动
聊城东昌古城		2009 年	政府主导	仿古重建	搬迁	过度开发带来不可逆的破坏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有关资料整理

从中可以看出,地方政府的古城空间生产行动实际上沿着两个路径展开。一是“历史—文化”的路径,通过不同的行动策略,保护古城历史建筑和文化资源,对古城居民的生活场所、生活方式进行更新改造,以实现古城空间的重塑。二是“政治—经济”的路径,地方政府古城更新的目标导向反映出强烈的政治经济动机,无论打造旅游景点、文化场所还是商业街区,地方政府都试图从中凸显自身的独特性,以实现古城乃至城市的营销。

### 三、历史建构 “历史—文化”路径下的古城重塑

古城首先呈现为历史文化的空间,古城更新中的空间生产策略首先就体现在重构关于古城的历史叙事。这并非基于简单的“还原”或是“再现”等方式,而是在复现古城建筑与场所肌理、营造古城“品牌”和场所精神、重构古城居民的生活交往方式和利益关系等方面,表现为一个“建构”的过程。

#### (一) 建筑与场所肌理的复现

针对历史文化保护所开展的古城空间生产,在物质空间层面体现为对古城原有历史建筑、文化遗迹、场所肌理的复现。地方政府通过保护修缮或仿古重建两种策略,在古城物质空间再造中实现历史建构。

##### 1. 识别古城物质空间的时空约束

古城普遍拥有着漫长时间跨度的历史叙事,伴随着空间尺度、建筑形态、街巷肌理等方面的延展和变革。而现在作为改造客体的古城空间,则是一个相对短暂和相对静态的时空呈现。因此,对城市管理者而言,古城更新规划和定位的起点,就是识别现有的物质空间基础,也即古城更新的时空约束。在此基础上,进行或倾向保护修缮或侧重仿古重建的政策选择。前者强调遵循时空约束,在保护古城的原真性的基础上进行选择性的建构;后者则实际上通过嵌入时空概念的物质性重建,超越古城物质空间的时

空约束,实现对历史的建构。

## 2. 在时空约束之内的选择性建构

尊重古城的原真性的“修旧如旧”,实际上是城市管理者在古城时空约束之内的选择性建构。一方面,尽管现存的古城空间是漫长时间跨度和空间拓展的结果,但古城空间生产是在选择代表性历史文化资源基础上的建构。以青州古城为例,其名可追溯至九州时的“海岱惟青州”,城市的发展建设可追溯至西汉时期的“广县城”,但因其现存的物质基础和空间肌理大多是以明清时期的城市发展高峰遗留为基础,故这座“千年古城”的空间生产呈现出典型的明清色彩。另一方面,古城空间生产也是有选择地对建筑进行保护和改造的过程。烟台在所城里和朝阳街改造中采用的“网格化”改造,即是将每栋建筑单独划分为一个“网格”,根据各网格内建筑的历史价值、现实状态、功能定位等,确定不同的保护级别,采取针对性的改造措施。

## 3. 超越时空约束的物质性重建

“仿古重建”通常被视作古城空间生产的一种变通之道,但往往会面对关于原真性的质疑,有学者将其评价为“在商业利益驱动下,进行的非历史保护的波普化行为,隐喻着强行推动空间绅士化的过程”<sup>①</sup>。实践中,不同城市的仿古重建产生了不同的行动结果。东昌古城作为“拆真建伪”的典型,受到学界和实务界的严厉批评和质疑;济南宽厚里通过仿古重建打造了一个在经济效益和游客规模上都表现尚佳的消费场所,但也被《济南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认定“经改造不再作为保护对象”。台儿庄古城的仿古重建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获评5A级景区,也被专家评价为“在一些具有突出历史文化价值的地区或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地,在现状风貌较差、经济面临突破或居民生活环境亟待改善的情况下实现城市更新,具有较好的借鉴意义”<sup>②</sup>。

这表明,在仿古重建中建构历史,重点不在“仿古”本身,而在于仿古建筑能否同历史文化的话语支撑相结合,其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叙事能否获得公众的认同。台儿庄古城在五十三处战争遗迹的基础上,围绕“江北水乡”“运河古城”“大战故地”“两岸交流”等历史文化叙事进行仿古重建,凸显出运河文化对城市空间历时性演变的形塑,传递着抗日战争期间的残酷历史与坚韧的民族精神。这种物质空间和历史文化叙事之间的契合是在仿古重建中建构历史的关键,依赖于政府同公众、企业在文化挖掘和场所改造中的有效合作。

## (二) 空间想象和场所精神的塑造

古城精神空间的营造,主要通过再现古城的文化载体,传承文化想象,营造市民对城市历史空间共同的“场所记忆”。在实践中,资本主导和权力主导成为两种典型的政策导向,以不同的方式实现对历史的建构。

### 1. 市场主导下依托文化载体的历史建构

由市场主导营造的场所精神,将建筑场所、历史文化符号打造为文化载体,承载着现代化的商业活动。一方面,古城的建筑场所和与之相关的民俗文化、历史记载、名人事迹成为旅游资源;另一方面,古城情结成为经营策略,激发人们对城市历史的情感依赖。如魏集古村落即是在历史叙事的古镇原址上重建一座仿古商业场所,而古镇的历史叙事和仿古的建筑形态,则成为激发市民古城情结的线索。总体而言,市场主导下的历史建构,往往是依托文化载体所进行的简单的利用和呈现,古城在精神空间层面更多是作为一种“消费场所”被认知。

<sup>①</sup>张京祥,邓化媛《解读城市近现代风貌型消费空间的塑造——基于空间生产理论的分析视角》,《国际城市规划》,2009年第1期。

<sup>②</sup>顾晓伟,阮仪三,王建波,李文墨,杨国栋《台儿庄古城区规划设计与实施经验探讨》,《规划师》,2011年第S1期。

## 2. 政府主导下嵌入文化内核的历史建构

政府主导之下的古城更新,往往将历史文化视作凝聚城市“场所记忆”的重要资源,在古城更新中嵌入城市的文化内核,由此引导居民城市形成“对自己的生活方式感到骄傲并努力推广其独特身份认同的‘爱城主义’”<sup>①</sup>。在实践中,这种嵌入文化内核的历史建构通常表现为两种方式。

一是地方政府在古城规划中的政策话语。规划是古城更新的起点,在这一环节,领导权力同专业权力展开合作,专家学者基于专业性的历史梳理、文化挖掘与建筑勘测,提出关于古城空间意向的建议;而城市管理者则利用政治权威,出台具有法律效力的规划,实现对古城空间意向的主导性话语建构,并通过资本在建设工程、工程进展等环节的运作进行监管,实现古城空间意向的物质性呈现。

二是政社互动过程中的民意参与。第一种类型可称之为“动员型参与”,主要表现为规划公示、座谈会等,这基本已成为地方政府古城空间生产决策的基本环节,但在现实中往往演变成一种事后参与和被动参与,参与的深度和效果均有限。除此之外,有时地方政府也通过特定的文化活动鼓励公众参与古城文化符号的设计,如青州古城面向民间进行的楹联征集活动,这种方式通常会给参与者带来较高的参与体验,但往往集中在微观层面的活动。另一种类型则是公众自发的“志愿型参与”。一来是有关古城历史文化的民间研究成果出版,以及历史文物的社会捐赠,这些都为古城空间意向构建提供重要的资源基础;二来则是如济南“泉水人家博物馆”、临清“胡同游”等由民间力量进行的文化场所运营或文化体验活动。

### (三) 居民社会空间的重构

对古城空间而言,历史不仅凝固在建筑中,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之中,还渗透进居民的生活方式和关系之中。留居和搬迁是地方政府对待原住民的两种政策立场,也意味着古城社会空间重构中两种不同的策略。

#### 1. 留居与空间保护修缮的协调

在古城空间生产中保留原住民,延续了既有的社会网络与日常生活,在历史建构中具有稳定性和传承性的优势。但同时也意味着,生产出的古城空间融合了既有的居住空间、演进至今有待修复的历史空间、更新改造试图塑造的商业空间。因此,在保留原住民的政策之下,地方政府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实现居住的空间使用与保护规划的匹配。在古城更新中,地方政府一方面对居民的使用行为进行强制性的政策约束,如烟台通过对历史文化街区内的建筑进行认定,划分“历史建筑”与“文保建筑”,严格规范居民的使用行为。另一方面,则是从规划出发,统一居民住宅修复的标准,并通过激励性的政策引导,对居民住宅的修缮给予财政补贴,推进民居空间的协调修复和适应性改造。

#### 2. 搬迁与居民情感纽带的维系

整体搬迁有助于管理者对古城空间的统一规划和改造设计,但同时切断了居民在生活和社区关系中同古城的空间联系。在整体性搬迁基础上所进行的历史建构,主要是重构和延续“古城”符号和情感纽带。

一方面,通过合理的利益补偿,避免由于利益剥夺导致的情感纽带断裂。随着历史演变,古城在代际延续、人口流动中形成了复杂的建筑产权关系。青州古城改造中曾有居民拿出了民国时期的地契;而在烟台所城里的院落之中,就存在共有产权、私有产权等多种产权形式,以及居住、经营、租赁等复杂的建筑使用形式。针对不同的产权关系进行产权认定,制定针对性的补偿政策,以避免古城空间生产带来的利益剥夺,成为维系居民古城情结的基本要求。

<sup>①</sup> [加]贝淡宁, [以]德里特《城市的精神: 全球化时代 城市何以安顿我们》,吴文伟译,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2年版,前言第4页。

另一方面,将居民纳入古城社会空间的重构过程中,也是维系居民情感纽带的重要策略。在场所精神塑造中鼓励民众参与历史建构,可以视作古城情结的一种“参与式延续”。而在社会关系的重构中,城市管理者也常采用另一种可称之为“进入式延续”的政策选择,即通过鼓励居民在“新古城”空间内从事文化活动和商业经营活动,使得住民依旧同古城保留有社会属性下的空间联系。

#### 四、城市营销“政治—经济”路径下的权力博弈

在古城空间生产的策略背后,地方政府有着重要的政治经济驱动,即承接更加现代化的商业业态,重构围绕新古城空间形成的空间秩序,推动实现绿色、可持续的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以提升城市竞争力。同时,古城空间生产行动的背后也交织着复杂的权力关系,行政权力、市场资本和社会力量相互交织,通过互动和博弈,推动古城物质空间、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的生产。

##### (一) 场所改造提升与业态布局中的权力运用

在“政治—经济”路径下对古城建筑和场所肌理的改造,实际上是对建筑空间功能的提升,以及古城业态布局、产品供给的升级,从而赋予古城对现代化经济活动的空间承载能力。这一过程中,行政权力、资本力量和社会力量通过在场所提升与业态布局中的运作,推动古城物质空间的生产。

##### 1. 场所提升中的空间权力协同

古城空间场所的改造提升是多元权力协同治理的过程,既是出于克服场所改造中技术难题的现实需求,也是克服市政公用事业主体分散化的客观要求。譬如,烟台所城里改造前最宽的街巷大约在6米左右,尽管当时足可以供马车通行,然而古城改造意味着在这6米宽的范围内要完成水、电、气、暖等设施的铺设。一方面,在有限的空间范围和既定的建筑结构约束下,场所的改造成为企业技术攻关与政府标准完善相协同的过程;另一方面,路面施工、管线铺设、环境营造等多项工程之间的流程衔接,以及管线铺设中不同市政公用事业单位的协调和对接,都需要通过政府权力实现不同部门的沟通和协同。

##### 2. 业态布局中的空间权力关系

古城物质空间的改造,通过行政权力主导的场所规划和资本参与实施的建筑提升,定义和实现古城空间内的场所功能和用途,以此为基础提供基于多元化资源挖掘的消费产品。通过对山东省古城更新的考察发现,地方政府在古城更新中通过打造餐饮娱乐消费场所、文化产业“橱窗”、公共文化场所,提供餐饮娱乐服务、民俗文化和历史记忆等旅游和文化“产品”。

这一过程同样体现为行政权力和资本力量互动博弈的过程。一方面,政府部门通过业态规划,从宏观上进行古城业态的空间配置,通过优惠性的政策设计进行招商引资,实现业态布局。另一方面,古城管理部门对资本开发利用古城资源,提供多元化文化消费产品,实现财富增值的过程进行运营监管,从而实现业态运营的规范化。

业态布局中资本的运转往往带来古城的“同质化”现象。“在这个古城能买到的东西,在别的古城一样能买到”成为多地古城运营方所共同流露出的尴尬和忧虑。这种同质化反映了空间资源资本化的特征,“资本投入一方面不断创造同质化的文化空间形态,另一方面,同质化的空间形态反过来又会极大促进资本在更大规模上的积累”<sup>①</sup>。此外,中产阶级导向的“绅士化”社会重构也是导致业态同质化的重要原因,由于中产阶层在经济基础、社会身份、阶层结构等方面具有较高的同质性,迎合中产阶层文化消费偏好的古城业态也随之呈现出典型的同质化特征。

<sup>①</sup>李和平、杨宁、张玛璐《后消费时代城市文化资本空间生产状况解析》,《人文地理》2016年第2期。

## (二) 城市品牌与城市营销中的空间权力推进

在“政治—经济”路径下,以历史建构所形成的场所记忆和空间想象为基础,地方政府同市场资本和社会力量进行合作,通过空间想象的传播,塑造市民和游客的古城印象,将场所精神打造为城市品牌,形成自身的竞争优势。

### 1. 古城更新作为城市竞争策略的权力驱动

通过打造古城品牌,城市挖掘出自身区别于其它竞争城市的核心价值。理念是城市品牌的灵魂,文化是城市品牌的核心,城市品牌形象建设是一次城市对自己文化的探索与建立,以实现其文化特色的凸显<sup>①</sup>。多数学者认同,城市竞争力反映了城市的综合能力<sup>②</sup>。在快速城镇化时期,城市竞争力主要依赖于土地开发所带来的财富增长与资本积累,而随着城市进入内涵式发展的转型时期,文化竞争力在城市竞争力中的作用日益重要,以至于有学者明确表示“文化竞争力决定城市竞争力”<sup>③</sup>。古城作为城市历史文化的集中呈现,是凝聚场所精神并外化为城市品牌的重要资源,地方政府往往通过设立对标学习或比较的城市,从中定位和凸显自身独特性,作为推动古城空间生产的重要理念。

### 2. 经营城市品牌的权力运作

在实践中,地方政府通常通过三种权力运作方式,推动古城品牌的经营。一是由政府组织的古城推介和招商宣传活动,地方政府基于地缘文化、空间距离、经济水平等考察古城旅游业潜在的主要市场,进行针对性的宣传推广,台儿庄古城早期的宣传主要依赖于这种方式,行政权力在其中呈现出一种带有市场化特征的运作方式。二是当地政府同地方和国家新闻媒体进行合作,对古城进行文化宣传和旅游推广,这一过程中行政权力同社会舆论之间呈现出联结与合作的特征。三是在重要时间节点推动的城市嘉年华等“大事件营销”,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行政权力和市场资本联合下,超越古城日常生活所进行的一种文化符号的生产。

## (三) 古城空间利用中的群体分化与权力调控

在“政治—经济”路径下,古城管理者、经营者、游客、原住民、城市市民等主体,对于古城空间使用价值的差异化需求,形成了群体之间的分化和博弈。

### 1. 差异性空间需求下的群体分化

哈维指出,在空间生产过程中,“个体的时间和空间并不自动地与占统治地位的公共意义保持一致”,进而“阶级、性别、文化、宗教和政治差别常常成为社会冲突的舞台”<sup>④</sup>,揭示了空间生产过程中群体分化与空间冲突的逻辑。在实践中,地方官员眼中作为历史地标与竞争品牌之“古城”、企业家眼中作为商业营利场所之“古城”、历史文物专家和规划学家眼中作为历史文化载体之“古城”、市民日常休闲和通行进入之“古城”、原住民眼中作为居住生活与城市公共服务享有之“古城”、游客文化旅游体验之“古城”等多种话语常常相互交织。因此,目前古城更新所带来的治理挑战,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差异性空间需求的群体分化以及由此形成的冲突和博弈。

### 2. 脱离日常生活的权力调控倾向

古城空间生产的过程中,存在针对不同群体差异化的空间需求所进行的权力调控,而这种调控在结果上表现为古城的“绅士化”趋势。有学者指出,拆建型的城市更新和阶层置换,是新建中产阶层化的物质表象,同时中产阶层群体融入新建社区,并赋予社区空间特定的文化属性“地租剥夺”和“精神创伤”

①张健康等《城市品牌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7页。

②范周主编《中国城市文化竞争力研究报告2015》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年版,第10页。

③单霁翔《甲午集》北京:故宫出版社,2015年版,第884页。

④[美]戴维·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55页。

等问题则导致被置换群体的边缘化和空间固化<sup>①</sup>。这一观点同样适用于解释在社会空间层面上的古城空间生产。实践中以商业化为导向的古城建设和运营,并未充分回应基于差异性空间需求而产生的群体分化,尤其体现为忽视市民和原住民关于“日常生活”的空间需求。随着古城居民“从院落到楼宇”,古城空间“从住区到景区”,古城业态布局和管理模式多呈现明显的商业化导向,对于城市管理者、企业与游客的空间需求偏好存在明显的迎合。

相应地,不论是倾向于封闭式景区的空间秩序,还是迎合中产阶层消费文化为主的业态布局,亦或是消费场所和文化建筑对街道、广场等休闲、出行等公共空间的占用,都使得目前商业化导向下的古城空间生产沿着一种超越日常生活的逻辑进行,市民日常的居住、生活、购物、交往等活动并不必然与古城空间相关。东昌古城改造后失去了原有的古韵,有居民表示“拆迁之前的古城好,热闹、自然还有生活味”,这种怀念是对古城作为日常生活空间最为质朴的诉求表达,市民围绕空间使用价值诉求所展开的抗争亦植根于其中。

## 五、古城空间生产中的路径交织

“历史—文化”路径反映了古城空间生产的策略表象,古城空间生产的政策制定往往诉诸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开发,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维度实现古城历史的建构,对历史文化进行保护和叙事。在其背后,古城空间生产实际上是“政治—经济”路径下行政权力、资本力量和社会力量的运作和博弈,这也成为古城空间生产的内在逻辑。

一方面,以古城更新为代表的文化导向的城市更新,无论是被视作经济发展政策的工具主义认识,还是被视作社会问题解决途径的功能主义认识<sup>②</sup>,都指向提升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城市竞争力的政治经济目标。另一方面,古城更新的空间生产过程,无论是古城场所提升和业态布局中的权力协同、打造城市品牌背后的竞争驱动还是社会空间重构中的群体分化,都表现为多元空间权力主体互动的政治经济过程(见图1)。针对古城空间生产中的权力冲突,应在权力运作过程中捍卫不同群体所具有的城市权利,实现多元协同、包容差异的空间生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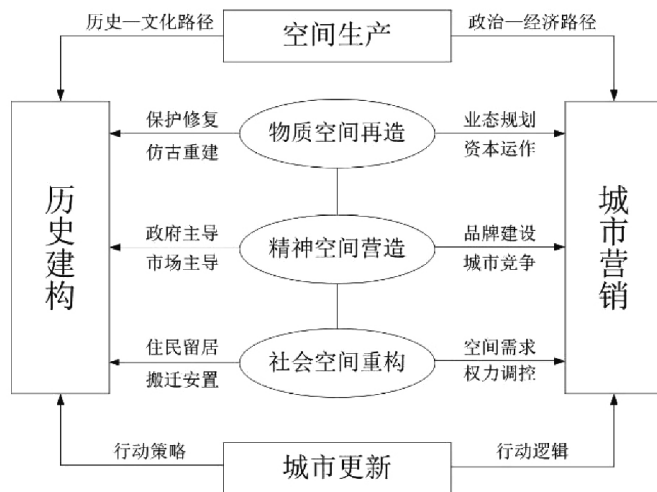


图1 古城空间生产双重路径下的行动策略与行动逻辑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①宋伟轩,王聪,刘春卉《中国大城市新建中产阶层化现象的供给端解析》,《人文地理》2018年第3期。

②黄晴,王佃利《城市更新的文化导向:理论内涵、实践模式及其经验启示》,《城市发展研究》2018年第10期。



其一,古城更新内在地要求保障居民的城市权利,增进城市正义。城市权利是一种积极地共同参与城市政治生活的方式,也包括“不被强行分类”的具有差异性的权利<sup>①</sup>,或者说是一种“按照我们的期望改变和改造城市的权利”<sup>②</sup>。城市化作为权利实现的过程,既要关注公民拥有城市的宏观权利,也要关注居民拥有社区的微观权利<sup>③</sup>。捍卫城市权利,增进城市正义,意味着对个人权利的明显侵害应当得到纠正和调整,公众对城市空间概念的不同理解,都有权进入空间概念的建构<sup>④</sup>。古城空间生产的过程应保障多元主体平等地参与历史建构,实现城市居民的身份认同。古城空间生产的结果应实现古城空间资源的公正配置,保障不同主体平等地享有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和生活环境,促进城市居民的身份平等。

其二,古城更新内在地要求实现多元、包容的空间生产过程。一是推进保护与发展之间的包容和平衡,凝聚文化底蕴,推进当代发展,算好古城更新这笔“文化账”“经济账”和“治理账”。二是推进公共性与商业性之间的包容和平衡,在横跨“公共性—商业性”价值连续统的多元利益诉求之间,以维护古城公共性为各界博弈的基本底线<sup>⑤</sup>。对商业性的过度迎合从某种程度上可视作是古城更新中的公共价值失灵现象,而维护古城公共性,处理好古城作为文化空间资源、消费空间资源、生活空间资源的角色功能关系,则成为弥合公共价值<sup>⑥</sup>的举措。三是推进规划美学与生活需求之间的包容和平衡,对我国古城而言,无论是延续反映地域特色生活习俗的建筑传统,还是致力于当代人生活提升的发展导向,古城空间生产都应更加重视市民对古城空间的生活需求。

[责任编辑:韩小凤]

①穆斯塔法·戴安科《正义与空间想象》,载彼得·马库塞等主编《寻找正义之城》,贾荣香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96页。

②[美]戴维·哈维《叛逆的城市:从城市权利到城市革命》,叶齐茂、倪晓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4页。

③姚尚建《城市发展的权利尺度》,《新视野》,2016年第5期。

④王玉龙《城市转型发展中空间善治的内涵与实现路径探析》,《东岳论丛》,2018年第7期。

⑤苗红培、陈颖《公共性视野下的古城保护》,《城市发展研究》,2015年第4期。

⑥王佃利、王铮《城市治理中邻避问题的公共价值失灵:问题缘起、分析框架和实践逻辑》,《学术研究》,2018年第5期。